

明代江西吉安府宗族祠庙祭祖研究

常建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唐宋以来江西吉安出了不少因科举成功而仕宦者, 重视儒学和文化, 多有世家大族。元代吉安宗族建祠祭祖已经比较成熟, 出现了个别总祠。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兴起于永乐以后, 正德后加快了建祠速度, 至明末建祠速度减慢。明代建祠祭祖有一个从前期家祠向中后期始祖祠, 或曰从前期小宗祠向中后期宗祠演变的过程, 明代中后期总祠普遍化。明代吉安宗族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成熟, 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设义塾等举措, 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 维持乡族社会秩序。吉安士大夫在祠堂记文里留下了建祠祭祖的探讨, 集中在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 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方面。明代中期以后, 士大夫更重视始祖祠堂管理族人的功能, 强调其功能的多样化。

关键词: 明代; 吉安; 宗族; 祠庙祭祖; 总祠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吉安原名庐陵, 隋代改为吉州, 元代为吉安路, 明代称吉安府。唐宋以来多世家大族, 文风特盛, 科举成就在全国名列前茅。特别是宋代出了文坛领袖欧阳修, 他还倡导纂修族谱, 对吉安府的人文、风气与修谱影响很大。明万历修《吉安府志》说:“至欧阳修一代大儒, 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 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敢谏为忠, 家诵诗书, 人怀慷慨, 文章节义遂甲天下。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 岁时祭祀必以礼, 长幼之节疏不间亲, 贵必下贱苍头、臧获获长子孙, 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家范肃于刑律, 乡评严于斧钺。士食旧德之名氏, 衣服先畴之畝亩, 流风遗俗盖庶几西京成周之间焉。”^①反映出宋明时期吉安府人文气象和世家大族的盛况。这里有深厚的儒学传统, 世家大族修谱建祠具有普遍性, 官宦与贱民等级森严, 士农分野清楚, 剖析吉安的宗族制度是有意义的。而且有关吉安宗族问题的文献记载非常丰富, 足以使我们依据资料把吉安宗族作为个案研究。笔者尚未发现对明代吉安宗族的研究, 兹就其祠庙祭祖问题试作探讨。

一、明代吉安宗族祠庙祭祖的概况

明代吉安世家大族建祠祭祖具有普遍性,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的议论清楚地反映出此点。如毛伯温说:“邑之名族率有祠, 乃自始祖以下, 世之远、服之暂, 皆得入祀。”^②万历时期刘元卿指出:“吾吉故尚礼义, 诸旧家名族所在创祠。”^③刘氏所说的“旧家名族”、毛氏所说的“名族”, 是建祠祭祖的宗族。罗洪先更强调:“吉安多巨族, 各以阀阅相侈竞, 又能严祠祀, 以萃睽离, 缉谱牒以明昭穆, 其意皆本儒者所论, 将以补宗法之不及, 而维持非不勤也。”^④认为建祠与修谱是吉安巨族常见的合族措施。吉安宗族众多而且重视睦族在全国是引人注目的, 大约隆庆万历之际, 泰和人胡直说:“余行天下多矣, 燕代不假言, 即邹鲁亦

^① 万历《吉安府志》卷一一《风土志》,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

^② 毛伯温《毛襄愍先生文集》卷四《邹氏祠堂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以下简称“四库存目”)本, 集部第63册第277页。

^③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桃溪大分姚氏祠记》, 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7页。

^④ 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一二《万安横街刘氏族谱序》,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全书”)本, 第1275册第279页。

未有尊祖睦亲加吾乡邑者。然吾乡邑非右族蕃硕，则力不赡，非夙姻于礼义，则亦不可与。”

①把有财力和知礼义作为尊祖睦亲进行宗族建设的必备条件，指出只有“右族”才能做到。明代吉安府辖有庐陵、泰和、吉水、永丰、安福、龙泉、万安、永新、永宁九县，关于当地宗族祠庙祭祖的情形，我们根据明人的祠堂记文等记载列出下表，进行全面而具体考察。

明代吉安宗族祠庙祭祖事例表

序号	属县·祠名	祠成时间	祠制	建祠者	所祭祖先	备注
1	庐陵·于氏祠堂	洪武-永乐	因其旧祠而新之	于孟逊	高曾祖父四龛，以西为上	增田供祀
2	泰和·祀先堂	洪武末-永乐初	即祖居旧基为堂四楹	吴惠等		宋绍兴来居，十余世
3	泰和·奉先祠	永乐16年	居室东南，四楹	萧鹏汉	四室奉祖考	南溪萧氏
4	吉水·祠堂	永乐-正统	元以杨万里故居为祠六楹，重修，增设始祖等龛	杨季琛	始祖吉州公以下，小宗显宦从祀	废像设用木主
5	庐陵·刘氏祠堂	永乐-正统	旧祠毁于兵燹，于所居之南新建	刘仲戡		新置祭田三十亩
6	安福·潘氏祠堂	永乐-正统	主要依据《家礼》	潘多吉	祖（始迁）、父	拟世祀祖
7	万安·曾氏祠堂	永乐末-景泰初	依《家礼》择地建祠		始迁祖	合两派子孙
8	安福·王氏先祠	永乐末-正统	大率准《家礼》，四楹	王斐	祀曾、祖、父	曾祖为棠溪始迁祖
9	吉水·李氏祠堂	永乐末-正统	所居之旁	李求正		小宗祠
10	吉水·周氏祠堂	宣德7年	仿《家礼》	周叙，字功叙	始迁祖沂滨公	祠在始祖墓南百余步
11	安福·刘氏祠堂	宣德3年	悉遵《家礼》		四代	
12	泰和·杨氏祠堂	宣德8年	居之右，依《家礼》	杨士奇	四代	元代建祠，后毁于兵火
13	永新·承庆堂	正统4年		尹绍兴十七世	纪念十二，十三世	牛田尹氏
14	永宁·尹氏祠堂	正统12年	依《家礼》	尹子奇		元季祠废
15	吉水·世显堂	正统2年		尹昭		元始建，元季毁
16	吉水·双义祠	天顺2年	居南近地	尹岱	父母	中列二像
17	泰和·尹氏祠堂	成化5年	重修居之左，三楹	尹迪镐	历代考妣	祭田二十亩
18	泰和·曾氏祠堂	成化				重修
19	吉水·王氏始祖祠	成化14年	七龛三级	王佐	三位始迁祖及一位祖先	旧祠元季毁于兵
20	安福·伍氏祠堂	成化20年	县东前街之居	伍希渊	始祖以下	七房轮祭
21	安福·伍氏祠堂	弘治2年	县之荷溪，扩建	伍希渊	高祖以下本支	天顺创祠
22	吉水·敦本堂	弘治15年	参酌《家礼》拓建，三楹	罗尧民	六世祖之主不祧	旧祠毁于元季
23	泰和·祀先堂	弘治17年	扩建为四楹	胡学固		工费二百金
24	万安·黎氏祠堂	正德4年	拓地新建，设四室二庑		四代之主，群从之主	有“黎半县”之称
25	庐陵·祀先堂	正德	族屋当中	彭用迁	始祖以下数十主	旧祠废于元末兵燹
26	庐陵·复古堂	正德	族屋当中	彭用迁	祀四小宗	旧祠废于元末兵燹
27	吉水·邹氏祠堂	嘉靖15年	辟地而建		始祖	始迁以来十七世
28	万安·孝义堂	正德-嘉靖		萧氏		旧祠毁

① 胡直《衡庐续稿》卷三《敦典堂记》，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715页。

29	府治·杨氏忠节总祠	嘉靖 9 年		杨必进	宋以来忠节者	旧有祠
30	庐陵·黄氏先祠	正德-嘉靖		黄洁庵	四代，中为上	
31	永新·刘氏祠堂	正德 9 年	增前堂三间为七，建登仕祠、旌节祠	刘扬休		增建旧祠，有祭田
32	永新·乐伦堂	正德	元泰定间作堂，增修	戴氏	宋代始祖	始祖系萧氏赘者
33	泰和·王氏祠堂	嘉靖 7 年	前堂四楹		宋代始迁祖	旧有祠堂
34	泰和·曾公祠	嘉靖	正寝之东	曾宪	始迁祖（木像）	专祠
35	泰和·祠堂	嘉靖初年		罗钦顺	始迁祖	大宗祠
36	泰和·小宗祠	嘉靖初年		罗钦顺	曾、祖、考	
37	泰和·明裡堂	嘉靖		曾于鉴	高祖以上	
38	吉水·祠堂	嘉靖 27 年		罗洪先	始祖以下	重建祠堂
39	吉水·祠堂	嘉靖 30 年		罗洪先		重建祠堂
40	吉水·通祠	嘉靖		李野航	始、先、四亲	重建
41	吉水·朝宗堂	嘉靖 19 年		梁方泰	父	
42	永新·戴氏祠堂	嘉靖	卜地村北，总祠		始祖	元季兵燹祠毁
43	永丰·小宗祠	嘉靖-隆庆		郭氏	时亨公以下五世	源头派祠堂
44	府治·崇珂公祠	嘉靖 45 年	购地郡西，总祠，七室	尹一仁等	崇珂公，配以各始迁祖	工费三千金
45	泰和·杨氏祠堂	嘉靖-隆庆	择县东城学校，七楹，合祠	杨载鸣等	始祖以下	冬至祭祖
46	泰和·敦典堂	隆庆 4 年	以旧祠为寝，新建			漆田周氏
47	泰和·孝友堂	万历 2 年	尹氏下睦瑶溪支祠	本支		
48	永新·敬爱堂	万历 4 年	尹氏竹山鸥溪洋埠支祠	尹晶		义田六十亩
49	泰和·承德堂	万历 13 年	云盘尹氏支祠	尹甫金		
50	永新·竹山祖祠	万历 19 年	竹山尹氏祖祠	尹新		各支合成
51	安福·赵氏祠堂	万历 19 年				宋燕王裔
52	永新·著存堂	万历	江氏小宗祠	江卓		家庙久圯
53	安福·姚氏祠堂	万历	隆庆间太祖祠圯，新修统宗祠		始祖	宣德间修太祖祠，
54	安福·鱼石祠堂	万历	割所居为祠	李本振等	支祖复庵公	
55	安福·谭氏先祠	万历 11 年	扩建旧祠	谭岳南		设义田一三 0 亩
56	永新·承庆堂	万历 24 年	旧祠址，三楹	尹学孔	牛田尹氏始祖	
57	永新·大经堂	万历 28 年				南塘之尹
58	庐陵·小宗祠	万历 38 年				富田尹氏
59	吉水·忠孝堂	万历 44 年	枫塘尹氏			旧有祠
60	泰和·南溪萧氏总祠	万历	本始堂，五楹	萧希高	始祖	萧各有祀高曾祖三代祠
61	泰和·忠孝堂	万历	家祠	萧氏	支祖徽士公	南溪萧氏
62	泰和·五实堂	万历 4 年	元广居堂旧址扩建	郭子章父	四房始祖广居公	另有大宗祠复古堂
63	泰和·小宗祠	万历 40 年	建于大宗祠右，特祠	郭子章	祖、父	另有崇德祠、仁让堂、寿堂等特祠
64	泰和·西坡府君祠堂	万历 43 年	特祠	郭子章	曾祖	

注：本表资料出处请参看文后附表。

下面我们对上表加以说明：

吉安宗族祠堂的地区数量分布。总计 64 例，其中府治 2 例，庐陵 5 例，泰和 21 例，吉

水 13 例，永丰 1 例，安福 9 例，万安 3 例，永新 9 例，永宁 1 例。万安未发现有关事例。吉安府九县中，祠堂事例主要集中在泰和、吉水、安福、永新、庐陵等中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永丰和西南地区的永宁、龙泉祠堂事例较少。宗族祠堂的分布与科举人才的分布是一致的，明初吉水人解缙指出：“吉之属邑有九，而庐陵、吉水、永丰、泰和、安福、永新之出尤盛”^①。吉泰盆地开发较早，经济与文化均较强盛，多有世家大族，祠堂集中这一地区。

吉安宗族祠堂的各县姓氏分布。府治有杨、尹 2 姓。庐陵有于、刘、彭、黄、尹 5 姓，其中序号 25、26 的彭姓，系一族同时设立两所祠堂。泰和有吴、萧、杨、尹、曾、胡、王、罗、周、郭 10 姓，其中序号 3、60、61 的都系南溪萧姓；序号 12 和 45 的杨姓，系一族先后修有家祠和总祠两所祠堂；序号 17、47、49 都是尹姓事例，出自宋代共同的始祖；序号 18、34、37 都出自曾姓，三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序号 35 和 36 的是罗姓一族前后脚所建的两所大、小宗祠；序号 62-64 是郭姓一族先后所建的 3 所祠堂。吉水有杨、李、周、尹、王、罗、邹 7 姓，其中序号 9、40 两例出自李姓，前一例系小宗祠，后一例为大宗祠；序号 15、16、59 同系拥有共同始祖的尹姓。永丰有郭姓 1 例。安福有潘、王、刘、赵、伍、姚、李、谭 8 姓。万安有曾、黎、萧 3 姓。永新有尹、刘、戴、江 4 姓，其中序号 13、48、50、56、57 诸例均系尹氏诸族祠堂。永宁有尹姓 1 例。归纳起来，各县祠堂姓氏数量多寡如下：泰和 10 姓、安福 8 姓、吉水 7 姓、永新 4 姓、庐陵 3 姓、万安 3 姓、永丰 1 姓、永宁 1 姓。

祠堂名称。以某氏祠堂命名者最多。此外有在堂或祠前冠以祭祀和怀念祖先词汇的，如祀先堂、奉先祠、明禋堂、宗先堂，尤以祀先堂为多，计有 3 例。有在堂或祠前冠以表达一些人伦道德和文化追求的，如承庆堂、世显堂、敦本堂、复古堂、孝义堂、乐伦堂、敦典堂、孝友堂、敬爱堂、承德堂、著存堂、忠孝堂、五实堂，尤以表达忠孝、尊祖、尚德观念的为多。有表示祠堂祭祖和收族范围的，如始祖祠、总祠、通祠、小宗祠。有表示属于祖先祠堂的，如先祠、祖祠。还有以祖先名字命名的，如崇珂公祠、西坡府君祠堂，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崇珂公祠是以始祖命名的总祠，而西坡府君祠堂只是近祖的特祠。一些祠堂也往往在祠堂名称中加上所在地名的说明。

吉安宗族祠堂设置的时间分布。关于宗族祠堂的记文中，有的详细记载设置时间，有的则不记载设置时间，我们只好依据一般情况下祠堂设置不久请人作记，且祠记作者属于年纪较长的仕宦名人，而根据祠记作者的中进士、出仕和致仕与卒年时间，参考祠记的记事来推断建祠的时间跨度。考虑到这种情况，加上建祠数量在不同朝代的分布以及明代的社会的历时性变化。我们把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的时间分布划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时段，从洪武到天顺，计 97 年。建祠共 16 例，大约平均 6.1 年有 1 例。建祠的朝代分布比较均匀，惟洪武时期长达 31 年，有可能是这一时期建祠的事例不过两例，太少。估计是因为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朱元璋打击江南大族造成的。第二时段，从成化到隆庆，计 128 年。共建祠 30 例、大约平均 4.3 年有 1 例，较第一时段加快了建祠速度。这一时段，成化 23 年有 4 例、弘治 18 年有 3 例、正德 16 年有 5 例、嘉靖 45 年有 11 例、隆庆 6 年有 1 例，另外正德-嘉靖有 2 例、嘉靖-隆庆有 2 例，正德以后建祠数量增多是引人注目的。如果把成化和弘治两朝加在一起，计 41 年共有 7 例，平均约 5.9 年有 1 例，比第一时段的平均 6.1 年有 1 例稍快；而正德-隆庆三朝计 67 年共有 21 例，平均 3.2 年有 1 例，比第一时段快了近 1 倍，可见第二时段建祠速度加快主要是在正德以后。第三时段，为万历朝，计 48 年。共建祠 18 例，平均约 2.7 年有 1 例。建祠速度比正德-隆庆又有所加快。天启-崇祯 24 年没有发现建祠事例，推测主要原因在于明末的社会混乱局面，建祠者不多。总之，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兴起于永乐以后，正德以后加快了建祠速度，至明末建祠速度减慢。

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一些制度，也以成化为界呈现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不同。表中“祠制”和“所祭祖先”显示，记文明确指出祠堂依《家礼》设立的有序号 6、7、8、10、11、

^①解缙《文毅集》卷十《永新进士题名记》，四库全书第 1230 册第 749 页。

12、14 诸例，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祠制显然出自《家礼》的则有序号 1、3、16 各例，这些事例均在明前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祠堂建于居旁，规模较小，祭祀近世四代祖先。这一时期我们只发现第 4、6 两例明确指出祭祀年代较远的始祖。说明明初人们比较遵守《家礼》祭祖。进入明代中后期，记文中不再强调依据《家礼》建祠祭祖了，只有序号 22 例明确指出参酌《家礼》建祠。所建祠堂多有离开居室另建或扩大的情形，扩建、拓建、扩地、拓地、辟地、卜地、购地、新建等词汇正是这一时期祠堂建设的写照。祭祀始祖大宗祠堂的增加也反映了该时期祠堂的特点，表中序号 17、19、20、25、27、29、32、33、35、38、40、42、44、45、50、53、56、60 计 18 诸例祠堂即属于此类。而且一族多祠的事例也主要出现在明代中后期。总而言之，明代建祠祭祖有一个从前期家祠向中后期宗祠，或曰从前期小宗祠向中后期大宗祠演变的过程。

表中“祠制”和“备注”还有关于祠堂新旧情况的记载。表中序号 1、4、5、12、14、15、19、22、25、26、32、42、62 计 13 各例祠堂，都因元代所建祠堂或于元季兵燹而在明代重建。序号 16、18、20、28、29、30、33、39、40、46、52、53、55、56、59 计 15 例均记载原有旧祠，后来重新修建。以上两项相加共计 28 例，占总数 64 例的比例约为 44%，数量不小。换言之，明代吉安宗族祠堂事例大约将近一半是在旧祠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宗族在元代已经设置祠堂。吉安宗族建祠祭祖有比较深厚的基础。

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设置与士大夫关系密切。我们虽然没对建祠者身份详细统计分析，但祠记内容表明祠堂的设立不是士大夫亲自进行，就是指导族人完成。有一些祠堂的设置出自著名学者和高级官僚之手，如杨士奇、罗钦顺、罗洪先、郭子章等人就是显例。

二、元明时期吉安宗族祠堂的发展

（一）元代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兴起

我们在本文上一部分指出，元代已经有不少宗族设立祠堂祭祖。那么宋代吉安的情形如何呢？王善军专门研究宋代宗族，著有《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①一书，我阅读该书，未发现宋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事例，我也没有在其它资料中发现宋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事例，因此推测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大致是从元代开始的。我还从元人的三部文集中，发现了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一些事例。

一部文集是欧阳玄的《圭斋文集》。欧阳玄，字原功，浏阳人，延祐二年（1315）进士，至正十七年（1357）卒。文集中有元代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的 3 个事例。

其一，安福刘氏。据《保靚祠堂记》记载：“保靚祠堂者，安成刘君尚节祠其七世祖考保靚先生者也。先生讳作，字贤砺，保靚其号，居袁吉间地曰秀源。在宋乾淳，一时声光烨然。起于郡邑，初用州商，授将仕郎，辟赣之安远尉，母老不赴。中岁韞德保才，不屑州用，友当时缙绅。……百余年来，世代变迁，遗韵日远。诸孙尚节幼负志气，读其遗书，慨然慕其生平，惧其亲尽既久后人无所瞻仰，谋即故居建祠堂以致专祠。……至元后庚辰春祠成，置龕奉保靚主，列碑其前，议割上腴田若干，以给常祀，择日率族属子姓祭以告成，竣事而饮。”^②可知刘尚节在至元六年（庚辰，1340）于宋人保靚公的故居建成祠堂，祭祀这位七世祖，同时置有祭田。该祠虽是保靚公的专祠，但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族祠堂的性质。文中有“安成刘君”之语，安成既指安福也指吉安^③，根据文中语句“居袁吉间”而安福与袁州毗邻，推断此处安成当指安福。

^①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保靚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10 册第 38 页。

^③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五六《吉安府》说“郡名：庐陵、安成、螺川。”其中庐陵、安成是沿袭汉朝名称，见三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7 页。

其二，秀川罗氏。《秀川罗氏祠堂记》记载：“先尚书公游乡校时，善校官罗子远。子远，庐陵秀川世族，笃学力行，有诗文传于世，后为朝请大夫，主榷货物，言贾丞相专权误国，弃官去。予家藏其遗墨，思欲见其子孙，令其族孙仁达过予。为人英敏有为，为文雄畅有气，予于是喜前友文献之有传焉。仁达徵予记其秀川祠堂，其言曰：‘吾祖大时府君，著藉秀川，四传至南塘府君，家日以大。府君之子若孙，始割乌石陂腴田若干亩为祀田，时宋嘉祐二年（1057）也。其后乃贡于舍、贡于乡、登第于礼部，凡百数十人。于是蓬山先生、溪园先生与其子苍崖公、礪谷公推广祀田遗意，追远则有拜墓有合祭，合族则有族谱有聚拜，迄今三百余年祀田世守如初。族虽散居，昭穆秩然，必不可乱，邈在万里，相见相问外，有骨肉爱不相视途人，是皆吾祖贻谋之德与闻人善述之功也。惟祠堂未立，合祭聚拜无定，所议者咸病焉。按《家礼》祠堂在正寝之东，贞之居，厅事之东有堂，曰：迺绵。凡十有八楹，其深二丈有奇，其袤称之。堂之前有轩，轩之外有亭，高明深靓，宜祠。乃请掌记本翁以为祠堂，祠大时府君而下八世至十二世各图分派之祖，止其有行谊、有文学、有爵位者特祠焉。于是禹圭与翁之子绳祖、第一图孙瑛、第十图孙兰复买田为洒扫修治薰燎之费。自是合祭于斯，聚拜于斯，与祠田相为永久，以卒前人之志，先生幸一言以昭来者。’予既嘉仁达之能世其学，又嘉其宗之能念其祖，窃喜载名姓其间，自附通家之后，有荣耀焉。乃谕与众曰：惟大姓，其祖必有隐德，非德无以蕃，无以著，无以久，久则我后人念之宜也。念之念之，奉其蒸尝云乎哉。……时予宗方作祠堂于故乡，以书来告成，秀川去予故乡百里而近，而祠堂之成适相先后，于是喜德之不孤也。”^①罗氏，文中谓“庐陵秀川世族”，此庐陵是指吉安，实际上该族在吉水，即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序号37的罗洪先宗族，在嘉靖年间重建始祖祠堂。我们看到该族在宋代就重视收族，置祭田进行墓祭，修族谱合族。不过建立祠堂则是在元代至正年间[从宋嘉祐二年（1057）下推三百年为至正十七年（1357）]。该祠依《家礼》建于居室之东，但祭祀始祖大时府君，设主有所变通。不独有偶，当时湖南浏阳人欧阳玄也刚好设立祠堂，于是非常高兴地为罗氏祠堂写下祠记。

其三，吉水刘氏。《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志铭》记载：“庐陵刘桂隐先生，……先生讳诜，字桂翁，号桂隐，其先清江之翟斜族也。翟斜之族，自宋公是、公非弟兄叔侄以文学闻天下，号江右三榴。先生之先世有讳滔字禹续者，由翟斜徙吉水之南岭。传六世至彦升、彦名两弟。……升自鹏举，五子竞爽。第四子曰，字端臣，生子少奇，字思贤，是为先生之高祖考。……（先生）生二岁失母，七岁失父，九岁宋亡。……晚即南岭，创始祖祠，率族子岁时祭祀，以正昭穆之序。……先生生以宋咸淳戊辰八月二十六日，卒以大元至正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年八十又三。”^②刘桂隐晚年大约是在至正年间，于祖先始迁地建始祖祠。

另一部文集为王礼的《麟原文集》。王礼，字子尚，后更字子让，庐陵人，元末为官，明兴不仕。文集中有元末建祠祭祖的两个事例。

第一例是曾氏。《曾氏祠堂记》记载：“祠堂建于郡玄妙观，何居？曾氏子本中为老子徒，悯其先人无主，祭者作也。曾氏世居邑之膏泽，本中幼失恃，遇忌日悲不自胜。迨长，归父骨烟涛千里之外，世难而家丧，时平而身老。于是建祠于观，以祀其先；捐田于祠，以永其祀。……予观王侯将相，施田宅于老佛之宫，以祈悠永者，往往而有一再传之后，小失其祭典，大忘其像设，祠之建改为收储之场，田之入悉供醴鲜之具，于斯时也，其将若之何。”^③这是一个在道观建祠堂祭父的事例，立祠者本人系道士，并捐田于祠。

第二例是欧阳氏。《欧阳氏永思堂记》记载：“……天下之人犹思之（指欧阳修），况吾庐陵乡国之人哉！乡国之人犹思之，况夫欧阳同族之子孙哉！同族之子孙而不公思，则不惟有愧于乡国之人，且有愧于天下之人矣！吉文，建寅公之族子也，盛年锐气，谓功业指可取

^①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秀川罗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39页。

^② 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10册第120-121页。

^③ 王礼《麟原前集》卷六《曾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13页。

有。留京师十余年一命未足偿，其志而崎岖，兵乱以老，比年还乡。作堂以奉先中祠文忠，而诸主列祀其次。字之曰：永思。”^①欧阳修后人所建的这一祠堂，实际上是始祖祠。

再一部文集是刘岳申的《申斋集》。刘岳申，吉水人，他在《广福寺舍田记》说，该寺创于唐，宋代曾氏、王氏曾经舍田于寺，元代至元年间李氏、旷氏相继舍田入寺。旷氏之子“于寺西偏经阁后作室，以祠其父，又为屋以居所渡僧供洒扫，又买田以给晨夕香灯、忌日饭僧等费。”^②这是向已有的佛寺施田，附设祠堂。旷氏在此祭祀父亲。

以上六例，除了两例在寺观立祠祭祀父亲外，其余四例所祭祖先超过了近祖四亲，宗族祠堂的性质明显，其中有三例是始祖祠，安福刘氏属于祭祀先祖的专祠。元代吉安宗族建祠祭祖已经比较成熟。

（二）明代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发展

关于宗族祠堂最详细的记载无疑是祠堂记，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就利用明人文集中的祠堂记论述了明代吉安宗族祠堂的概况。此外，明人传记文中也有记载传主通过设祠祭祖等活动进行宗族建设的内容。传记文对祠堂的记载虽不及祠堂记全面、详细，但是概括性强，还往往兼及祠堂以外的宗族事业，而且是把宗族建设放在传主的人生过程中介绍，因此自有其特色。下面我们将从明人文集传记文中收集到的吉安宗族设祠祭祖的事例，按照文集作者以及建祠的时间先后排列于下，然后加以分析。

1、泰和王氏。明初泰和人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记载，王沂，字子与，竹亭为居处之号。王氏“所居颇隘，别为一室，仿朱子《家礼》，作主以祀先，其制极备，岁时祭祀拜跪升降，动合礼仪。先世坟茔，子弟祭扫，率有定期，虽风雨不避。”^③王氏既在居室旁仿《家礼》建祠堂，也进行墓祭。

2、泰和月池彭氏。泰和人王直《彭先生墓表》记载：“泰和月池彭氏自宋以来为名家，仕之显者虽未至公卿，而诗书德义蔚然为望于乡邑。……先生讳启，字彦晦。其先徙自长沙，曾祖顺轩、祖德馨皆不仕，父叔介香山县丞先生，……及香山公再考绩，乞致仕，卒于旅舍。先生奉柩归，治丧悉依朱子《家礼》，不用浮屠。更立祠堂以祀先，岁时行事，必诚必敬。”^④

3、万安赖氏。王直《赖处士墓志铭》介绍赖氏：“族中初建祠堂以奉祭祀，既作而复废，处士相其有力者图兴复，独捐贲作前庑。高祖旅殡泰和灌溪，展省久旷，处士既率群从兄弟往拜墓下修祀事，岁以为常。初徙田西，名正堂曰终慕，东作家庙，西辟塾馆。又建启进庄，议积谷，子孙有志于学者，资给之。其识度卓伟，规模宏远矣。”^⑤赖氏家庙的所在地是田西，文中还说“以事亲作别业芙蓉山下田西之上”，芙蓉山位于万安，所以该家庙地属万安。赖氏除了建家庙外，还设义塾，置义塾庄田，资助子孙学业。

4、泰和罗氏。王直《罗先生妻张孺人合葬墓志铭》记载传主：“辛勤自营置产业，作居室必先建祠堂奉祖考，一依朱子《家礼》。”^⑥

5、泰和周氏。居于东舍举子岗，萧铤《秀水教谕周君墓表》介绍传主：“创祠堂以祀其先，买田二十亩以供祀事。”^⑦

6、庐陵周氏。杨嗣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斋周先生墓表》说周畏斋（1437-1498，成化五年进士）在成化、弘治时期“俸禄所入，举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⑧靳贵也说

^① 王礼《麟原后集》卷五《欧阳氏永思堂记》，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497页。

^② 刘岳申《申斋集》卷五《广福寺舍田记》，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238页。

^③ 梁潜《泊庵集》卷八《竹亭王先生行状》，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348页。

^④ 王直《抑庵文集》卷二八《彭先生墓表》，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120-121页。

^⑤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三《赖处士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69-270页。

^⑥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三《罗先生妻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72页。

^⑦ 萧铤《尚约文钞》卷九《秀水教谕周君墓表》，四库存目集部第33册第105页。

^⑧ 杨嗣昌《杨文恪公文集》卷五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畏斋周先生墓表》，续修四库全书1333册第159页。

周畏斋：“建祠堂，增祭田，修谱牒，惠族属，皆汲汲为之。”^①

7、泰和张氏。张氏居于泰和之沙里，泰和人欧阳铎《张处士得月墓志铭》说：“乡俗溺佛老师巫，致以施于婚葬，翁准《家礼》裁之。修族祠，续修谱系，增置祭田，皆先众倡义。”^②

8、安福刘氏。安福人邹守益《蒙庵刘君应占墓志铭》指出：“吾友蒙庵刘君应占望出丛桂，以宋水部南昌郡男德言为始祖。……疾亟犹属其族捐所佃官地构祠，以祀始祖，族人皆掩涕。”^③虽然我们并不知该祠是否建成，但是刘氏对建设始祖祠的追求则是无疑的。

9、庐陵萧氏。萧良宣，字敷化，卒于正德九年（1514）。永新尹襄《龙游知县萧公墓志铭》介绍萧良宣：“晚作一族祠堂，扁曰著存。与族人行礼其间。又置义田以供祭费，作文会堂，月召子姓习文者就试而激劝之。作宗范二十八事，示与此轩。”^④萧氏祠堂、宗范兼具，义田、族学咸备，宗族制度比较完整。

10、永新刘氏。尹襄《长宁训导刘君墓志铭》记载传主：“族建祠奉先，首率二弟割田以供祭费。曰：此吾父之志也，曷敢忘诸。”^⑤传主卒于正德七年。

11、泰和曾氏。泰和人欧阳德《东峰曾公墓志铭》说传主：“独祠祭、墓祭必亲，虽疾必扶以从。往岁割腴田贍小宗祠，又范金为镛，设立大宗祠，至是益加意。”^⑥曾氏先前有小宗祠，又增置大宗祠。

12、泰和郭氏。欧阳德《郭培斋翁墓志铭》介绍郭培斋：“翁尝割其腴田贍小宗祠，为亩者四，先是大宗之祀未有所贍，翁哀之族人，得金如干与众行，其息入岁久大赢则议则置贍田，而众固主贷，与翁异议，卒荡其金。故翁每自悼其志，惩道舍之谋，不复藉众力，以身先之。”^⑦也是在小宗祠之外，筹建大宗祠。

13、泰和王氏。欧阳德《杭平王公墓志铭》记载：“杭平公王氏，泰和南台举林人。……公既脱，尚少。自以为天续余生，日杜门远器，置诸子不问，惟修宗谱、创初祖祠，则躬率族督劝之。”^⑧王杭平卒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其晚年创设初祖祠。

14、泰和张氏。泰和人胡直《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介绍张玉屏：“丙辰公既解水部归，割己业均诸从子，卷卷睦宗缉谱，改建宗祠。改厝先京兆及其长兄，上逮曾祖、显祖，凡四垄。其为贫族举火者几，为侄孙、从孙举聘者几，……期而后倡行乡约，近耄尤力，盖公力艰拯危，维风变俗。”^⑨胡直嘉靖卅五年（1556）进士，卒于万历十三年（1585），故文中的丙辰，当是指嘉靖丙辰年即嘉靖卅五年。是年至万历初，张玉屏改建宗祠外，还修谱治墓、倡行乡约，热心于乡族建设。

15、泰和郭氏。胡直《云塘郭公墓志铭》说：“郭为予邑南故族。……公弱冠补诸生，又易名彦，即能辑郭氏谱。又议新祠屋，祠址故隘，企欲得公旁便地拓之。青乌氏曰：‘是地有吉气，筑居必大。’若后公曰：‘大吾一家孰与大一族。’乃力请西坡公指地，计若干丈。祠成，又以义起推祀始祖中丞公，因定祀仪，作《孝思录》。”^⑩郭氏的新祠也是始祖祠。

16、安福刘氏。安福人刘元卿《伯父时斋公圻志》谈其伯父：“于奉先合族则不遗余力，始新族祠，既乃辑谱牒，动费金以两计者数百，率措置有方。……先是谱牒散毁，诸远祖兆

^① 靳贵《戒庵文集》卷一四《明故嘉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周公神道碑》，四库存目集部第45册第607页。

^② 欧阳铎《欧阳恭简公文集》卷一八《张处士得月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64册第151页。

^③ 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十《蒙庵刘君应占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66册第174-176页。

^④ 尹襄《巽峰集》卷一一《龙游知县萧公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49页。

^⑤ 尹襄《巽峰集》卷一一《长宁训导刘君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53页。

^⑥ 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四《东峰曾公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80册第739页。

^⑦ 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五《郭培斋翁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80册第750页。

^⑧ 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五《杭平公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80册第757-758页。

^⑨ 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三六《水部尚书郎张玉屏先生寿藏铭》，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580页。

^⑩ 胡直《衡庐续稿》卷八《云塘郭公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742页。

域半入荆莽，靡不可推，按世父俱修复之。晚岁益积蓄，广增祭田，祠制祀仪，焕然大修。下挽世自营而不念其先人者，所在而是。有如世父之殫竭其力以奉先合族者，盖亦甚少覩睹已。”^①时斋公于奉先合族殫精竭力，新修族祠只是辑谱牒、复祖墓、增祭田等宗族建设中的一项。

17、泰和萧氏。泰和人郭子章《外曾王父萧黄州先生传》记载：“公归而隐南溪武姥间逾二十年，友爱弟侄，睦恤宗光，建祠碑于庙，明祭田碑于觉海寺桥、武陵碑于涂，明先塋志诸圯，修宗谱，序于家乘。”^②萧黄州的晚年是在致力于宗族建设中度过的。

以上 17 个事例中，地域分布为泰和 11 例最多，庐陵、安福各 2 例次之，万安、永新各 1 例又次之，分布的数量比例基本与本文第一部分表中的统计一致，还弥补了本文第一部分表中无万安事例之不足。关于时间分布，与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对照，大致上说第 1-4 例属于成化以前的第一时段，第 5-13 例属于成化至隆庆的第二时段，第 16-17 例属于万历的第三时段。而第 14-15 例则介于第二时段末与第三时段初的交叉时段。从建祠数量的各时段分布可以看出，成化以后建祠数量明显增加，宗族祠堂得到了发展。这与第一部分表中的统计是一致的，而且各个时段建祠祭祖的特点也是一致的。如在第一时段的 5 例中，第 1、4 例都讲到了依朱子《家礼》建祠祭祖，第 3 例说依朱子《家礼》治丧，第二时段只有第 7 例提到《家礼》对婚葬的影响，而且是在第二时段初期。显然明初依朱子《家礼》建祠祭祖比较普遍，祠堂的规模不是太大。至于建大宗祠、始祖祠则是明代中后期祠堂的特点，因为在第一时段只有第 2 例是创始祖祠，而第二时段的第 8、13、15 是建始祖祠，第 11、12 例为建大宗祠，数量增加。

以上 17 个事例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了明代吉安宗族制度已相当发展、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设义塾等举措，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维持乡族社会秩序。这些事例说明倡行建祠祭祖等宗族建设的主要是士大夫，传记文的作者多是吉安出身的名宦宿学，前者的作为受到后者的赞扬和支持，形成了当地的舆论崇尚。

（三）吉安宗族设祠祭祖过程的个案分析

以上我们综合分析了吉安宗族设祠祭祖过程和特点，下面再从个案的角度考察和验证，深化我们的认识。吉安宗族设祠祭祖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特点，是总祠的出现，我们将以拥有总祠的杨、尹、萧的三大姓氏为例探讨。

1、杨氏。吉安杨氏始迁祖是南唐虞部侍郎杨轺，轺二子：锐，徙吉水杨家庄；鋌，徙吉水湓塘。吉水杨氏在宋代出了不少名宦大儒，例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杨丕擢甲科，仕至屯田员外郎，知康州以清谨著，与乡人萧侍御、彭大博齐名，真宗于殿柱书“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杨纯师以文章显。蔡京用柄，洪州通判杨存与之抗争，其行卓然。杨邦乂（1086-1129），字希稷。政和进士，历蕲、庐、建康教授，后知溧阳县。金军入建康，因拒降被杀。宋谥忠襄，官其四子，入《宋史·忠义传》。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绍兴进士，工诗，性刚直。绍熙中以宝谟阁学士致仕，闻韩侂胄专权误国，草谏书毕，又书赠言于妻子而逝。赐谥文节，入《宋史·儒林传》。杨万里子长儒，仕至安抚使（或作经略使），曾捐俸入七十余代输民租，谥文惠。

吉水杨氏的后人修建了杨氏祠堂。杨学文在元代以湓塘杨万里故居为祠，有六楹之广。故居有宋光宗所书“诚斋”二字和元代揭傒斯、欧阳玄所写记文。由于岁久弗治，田芜宇倾。大约明初永乐-正统年间，南海令杨季琛倡率族人重修该祠，安福人进士李时勉所作祠记介绍说：“增设始祖吉州公及屯田、清谨二龛，诸小宗、显宦叙昭穆从祀。废像设用木主，刻世系、祀田、祭器、牲币、酒仪、设科条于碑阴，祭用冬至、立春，子孙缘岁专直祠祀，祠

^①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八《伯父时斋公圯志》，四库存目集部第 154 册第 204 页。

^② 郭子章《蟾衣生传草》卷一二《外曾王父萧黄州先生传》，四库存目集部第 155 册第 388 页。

宇坏漏，辄飭无怠，怠者罚如科条，所以尊祖而垂后，可谓远也已，可谓详也已。於乎！此可以世劝，岂特杨氏而已哉！”^①此次重修，杨氏祠堂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元代修祠旨在表彰节行，属于纪念名人的专祠。而明初则增设始祖杨轸和先祖杨丕二龛，以各支派始祖和显宦从祀，成为宗族祖先的祠堂；祭祖日用冬至和立春，显然是采取程颐的主张祭祀始祖和先祖；神位也由画像改为木主，从影堂向家庙转移。重修祠堂表达的是尊祖的主旨，名人专祠已变为宗祠。

湓塘杨氏祠堂岁久圯敝，嘉靖九年（己丑，1530）湓塘杨氏裔孙广西宪副杨必进另觅吉安府城西南白马废祠建立新祠。先是杨必进写信给江西省地方官鍾芳请求废祠之地建祠，并说是“屏淫（按：从白马祠名称看，该祠当是佛寺）显正，风教美事”。于是鍾芳给吉安知府杨彝檄文要其主持此事。杨必进乃率吉水、庐陵、泰和、永丰、安福、万安、信丰七邑子姓，醵金购地，建成杨氏忠节总祠。鍾芳为该祠写记，解释说：杨氏显者八，得谥者五，即前文所说的杨轸、杨丕、杨存、杨邦义（谥忠襄）、杨万里（谥文节）、杨长儒（谥文惠）外，另有吉水湓塘杨万里的从弟杨复，“为太常丞，历尉浏阳、零陵，皆以清苦称，谥贞静。”明人泰和杨士奇是杨氏最显者，他历辅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官至内阁大学士，进少师，文行卓然，为一代儒宗，卒谥文贞。“而祠独曰忠节，盖举盛以该之，沿旧额也。”下面他又接着讲了一段涉及杨氏忠节总祠性质的话：“古者，庙制王公以下各有差，庶人无庙祭于寝，由祢以上四世而止，私祀也。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国祀也。国祀以义，私祀以恩，亲尽则恩微，故高祖以上士庶不得祀焉，不系乎位之隆杀也。……杨氏如忠襄、文节关系名教，非一室之私祀，秩以恒祠固宜，自余阅世不迁，而以爵位附，其亦酌乎恩义之间乎。夫族衍则易蕃，蕃愈远则漠然如途之人不可辨。幸而有贤且显者为子若孙，祠而宗之，犹可因脉络之分，稽昭穆之序厉偷靡之俗，崇仁孝之风。是故法程系焉，纲维立焉，劝戒昭焉。庶犹愈于涣而忘乎。然易之假庙取义于萃，而尤申以大人之德，盖处萃为难，欲其善之也。是故定期会，均品式，程疏密，崇礼让，行之而允宜，守之而勿堕，则存乎其人焉。”^②在鍾芳看来，以古礼衡量杨氏总祠，纪念杨邦义、杨万里当属于国祀，已超出了私祀的限度，总祠所附官宦先祖，兼顾了恩义；若从睦族的角度，宗祠可移风易俗，关乎法程、纲维、劝戒，作用不小。即肯定总祠的宗祠性质。杨氏总祠系七邑杨氏子孙所建，弥补湓塘杨氏祠堂岁久圯敝之憾，而且联宗范围更广，实为杨氏的大宗始祖祠。事实上，总祠的建立只是杨必进联宗合族活动的一部分，他还在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与族人修成《庐陵杨氏重修大同谱》。该谱“盖欲以是统诸族，使诸族据以为谱者，皆不失所原。”是吉安杨氏的统族谱。可知在嘉靖前期，吉安杨氏在杨必进等官宦族人的倡率下进行了建总祠合族、修同谱统族的联宗活动。

泰和杨氏是吉安杨氏的另一大分支，重视建祠祭祖。杨轸的儿子杨锐之孙延安又从吉水杨家庄徙上径，延安孙允素始徙泰和，为泰和杨氏始祖。杨氏故有祠堂，建于居室之右，元季毁于战火。至明代，杨士奇致力于宗族建设，他于仁宗时（1425）进官，禄赐加厚，于是复作祠堂。他说：“吾高祖以前居邑东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学宫之北，居与祠堂作焉。作四十年而毁于兵，又二十年而沦于异姓，又五十有余年，而余始克复之。……祠成祀四代，岁时行事，悉尊朱氏礼。”^③杨士奇晚年实现了复建祠堂的夙愿，根据杨士奇的身份和祠制，我们知道该祠实际上是一所家庙。到了嘉靖-隆庆年间，杨士奇的来孙杨载鸣倡率族人，择县东城学后构“合祠”，其制堂敞七楹，中祀始祖，左右祔配历代道德和仕宦蔚然表树一时者，“后为寝室，楹如其堂之数，前辟中外二门，神厨、器库牖置咸秩。危栋杰甍，耀观四

^①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三《杨氏重修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698-699页。

^② 鍾芳《筠溪文集》卷九《庐陵杨氏忠节总祠》，四库存目集部第64册第575-576页。

^③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杨氏祠堂复建记》，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27页。

壤，杨氏之宗之巨，兹祠盖其称哉。”^①建于县城的这座壮观的大型始祖合祠，充分显示了泰和杨氏的极盛局面，其在当地应有很大影响。

2、尹氏。1998年尹氏族史研究所出版《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其中编汇集了大量祠堂碑铭、记文，资料全面、系统，便于我们对尹氏修祠祭祖的考察更接近实际。吉安的尹氏初祖是宋保信节度使钤辖吉州兵马尹崇珂，珂卒于吉，敕葬洛阳。而夫人潘氏先卒，葬安福。崇珂三子，伯昭吉、仲昭辑、季昭棻，遗命昭棻奉潘祀，居安福之尼山。而昭吉、昭辑实居洛。不久昭吉之子复来居吉水、泰和，泰和又衍而为汉川。昭辑之后宦于广，徙居。崇珂之父为平阳王尹显，其从曾孙为尹焞（著名学者，赐号和靖）。因遭金人之祸，焞以侄孙镇为其子均后，家于浙。平阳王尹显的八世祖为唐尚书天水公思贞。思贞二子：长集贤学士愔，则尹显所从出；次江南西路安抚使忆，传七世乃居永新竹山。以上是尹氏分衍的概况。

至明代嘉靖、隆庆之际，尹氏在各地的分布如下：吉安为安福的诚门、厚林、集凤，吉水的新市，永新的牛田、洲陂、南株，泰和的灌塘、冻溪、逢原、山田、大湖，庐陵的富田，永宁的古田。湖广汉阳为汉川的张池口。广东的崇珂后裔居于东莞、增城、博罗、新会、新宁。浙江尹焞的后代分布在龙游、会稽、嵊县，又分衍至永新竹山。其实这些县以下的地名也只是主要的支派祖先所在地，从这些地方又分衍出更小的支派。如永新“竹山尹姓，其先自廉州刺史孚居烟冈竹山，三传至平事公材，自洋埠苦竹坪为始迁祖。”^②竹山之下又分出洋埠。在吉安尹氏遍布安福、吉水、永新、泰和、庐陵、永宁六县。

关于吉安尹氏建祠祭祖的过程，从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可以看出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序号12-16，处于正统四年（1439）到成化五年（1469），即十五世纪的三十年代末至十五世纪的六十年代末30年间建了5所祠堂。大致上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时段。其中序号13的永宁大陇尹氏和序号14的吉水新市尹氏都在元代建有祠堂，序号16的泰和灌塘尹氏亦有旧祠，其它两所祠堂即序号12的永新牛田尹氏、序号15的吉水枫塘尹氏则是创建。另一次高潮为序号43、46-49和55-58，处于嘉靖四五年（1566）万历二年（1574）到万历四四年（1616）即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中到十七世纪一十年代中的50年间建了9所祠堂。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二时段末和第三时段。实际上第二次建祠高潮导源于嘉靖年间开始的修通谱和建总祠。永新人尹绅有志于宗族建设，嘉靖三十三年（1554）临终之际对两个儿子学孔、学周说：“余弗起矣，吾尝欲建始祖宋节度公总祠于吉郡，联公位下散徙江浙、广楚、云贵派宗支，纂修通谱，立义塾教育一族子侄，捐租以资膏火。今无及，汝兄弟尚各努力图之。”^③总祠的直接倡议人则是安福人官为归德知府的尹一仁，在永新学孔、泰和灌塘礼用（按：一仁、学孔、礼用皆同出崇珂季子昭棻）以及楚、浙等各派的支持下，集资银三千两，嘉靖四十三年兴建于吉安城西郭，嘉靖四十五年建成。该祠“专祀节度，自节度而下，凡诸宗始迁及贤且贵与有劳于祠者，咸得附食。节度之上世可知者，则谱而不祠”。^④这样的总祠得到了地方官的首肯，吉安知府刘教为总祠的后寝孚萃堂写记，认为当时的宗族祠堂“祠自四亲外合而祠者，难于中礼而及远”。尹氏总祠“其祠之专与附者，合数省而于礼曲中焉。”^⑤符合“一本”之义。尹氏总祠建于府治，且得到知府的支持，其影响恐怕不小。另外，尹学孔兄弟买田二百亩于嘉靖三十九年置义塾田，在嘉靖四十二年与安福尹一仁合撰《尹氏通谱》，万历二十八年又与汉川尹应元合撰北派通谱，奉尹崇珂为一世祖。嘉靖、万历之际尹氏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合族活动。

^① 尹台《洞麓堂集》卷四《泰和杨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532页。

^② 龙遂《江西永新竹山鸥溪洋埠祠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尹氏族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666页。

^③ 李俨《江西永新牛山公墓表》，《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0页。

^④ 刘教《江西吉安尹氏孚萃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1页。

^⑤ 刘教《江西吉安尹氏孚萃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1页。

总祠的建立推动了各支派祠堂的建立。永新竹山洋埠尹氏鉴于去吉安和竹山祭祖地远，遂于万历四年创敬爱堂，岁旦合支内分居者展拜。竹山支系由湖南茶陵火田徙来，“家有谱，支有祠。”竹山始祖也列入总祠，为了会享，于万历十九年建成竹山祖祠。所以尹氏在万历年间绵延不绝地建祠祭祖，是合族性的宗族制度化活动。

3、萧氏。吉安萧氏追溯始祖皆说唐末五代宋初之际由长沙避马殷乱徙来，泰和南溪萧氏只是吉安萧氏诸多派系之一。永乐年间泰和人王直所作《南溪萧氏房谱序》，叙述南溪萧氏世系甚详：“南溪萧氏，楚军巡判官觉之裔。军巡避自长沙来奔，居泰和之早禾渡，子清卿徙庐源。清卿后三世曰演，生四子：其长曰大承事，始徙居南溪。大承事三世曰济行，生三子：尧卿、舜卿、汉卿。舜卿生祥甫，祥甫又生五子：德高、德明、德仁、德美、南山。德明子信可早卒，而以弟南山为子，从元俗也。”南山子兰谷，“兰谷生三子：自新、自明、自成。自新生鹏起、鹏举；自成生鹏南、鹏翔、鹏汉；自明继信可，无子，而复以鹏起继之。于斯之时，萧氏为最盛。”^①南山派房谱作于鹏翔，鹏举孙彦澄增修，王直为之作序。南山派萧鹏汉还在永乐十六年（1418）于居室东南建奉先祠，为四室祭祀祖考，属于家祠（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序号 3）。南山派在明初出了不少士大夫，萧鹏举曾官山东运副，其子“孟勤入翰林，为侍读，孙彦清为国子助教。鹏翔甫之子叔章、鹏汉甫之孙铨，皆以明经为县学训导，衣冠文物之盛，他族罕比。”^②明初南山派的修谱建祠正是在这些士大夫推动下进行的。南溪萧氏另有家祠忠孝堂，祭祀支祖徵士公（本文第一部分表中序号 60），大约修于万历年间。

南溪萧氏在万历年间还创建了总祠。据吉水人邹元标作《南溪萧氏总祠记》说：“萧故各有祠，然各祀高曾祖三代者，而始祖大承事公则未有祠。昔少师及诸君子欲祀始祖，议弗克就。”^③邹的同僚萧希高在南溪建本始堂五楹，祭祀始祖大承事公，实现了萧氏先人少师等人的夙愿。总祠的建立，标志着南溪萧氏诸族的进一步结合。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吉安大姓宗族兴建总祠合族，实际上吉安在元代已经出现个别总祠，至明代中后期则普遍化，吉安的大族以总祠为重要手段使宗族组织化。例如，永新梅溪戴氏宗族，唐代迁居于此。唐历元擢科第、由荐辟者 32 人，明代亦不乏其人。该族在元代建有总祠，著名学者虞集曾经为之撰写祠记。该祠元季毁于兵燹，明弘治中徙建于湖塘，未几复圯。嘉靖时又于村北创祠，请同乡进士、家居旧官宋仪望撰写祠碑。宋氏的评论非常重要，带给我们吉安宗族社会的总体认识。他说：“汉唐以还，制士大夫以上始得立庙，庶人则祭于寝。其后伊川程氏乃定始祖之祭，朱子谓庶人无庙，复以祠堂易之，而始祖之祭犹有异同。二公皆当时大儒，而议论规制犹不能一，况当元季之朝，其纪纲政教视有宋不逮远甚，而梅溪戴氏独能遵明程朱之意，创立总祠，以祀始祖，可谓拔出流俗。……予尝遍考戴氏之乡，其地多深山大谷，靛林茂野，鹫桀悍戾；其俗多尚气节，喜争斗。百余年来，诸所云故家巨族，皆立总祠，以联束其族人。凡岁时祭祀之节，聚会宴飧之规，疏戚庆唁之文，皆聚众于祠，讲而行之。至于轶行不轨之夫，强吏所不能致，文法所不能绳，一为族人觉发，则告之总祠，而共弃之。不特严祖考供祭祀已也，可谓厚矣！予尝以为三代礼废，宗法不行，而祠堂之制犹能谨于始祖，维持礼法，以翊辅教化，实有先世大宗遗意，所谓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者欤。”^④宋仪望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中仕至大理卿，他所说的“百余年来，诸所云故家巨族，皆立总祠，以联束其族人。”姑以十五世纪中叶的嘉靖三十年（1550）上溯百年，时为景泰元年（1450）。也就是说，十四世纪中叶的明中期以降，吉安的古家巨族普遍地设立总祠，以联合并约束其族人。宋氏还指出，建祠不仅是为了祭祖、

^①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七《南溪萧氏房谱序》，四库全书第 1241 册第 737 页。

^② 王直《抑庵文集》卷一七《南溪萧氏房谱序》，四库全书第 1241 册第 737 页。

^③ 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下《南溪萧氏总祠》，四库全书第 1294 册第 211-213 页。

^④ 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六《梅溪戴氏祠堂碑》，四库存目集部第 116 册第 358-359 页。

聚会以及办理族务，更重要的是以宗族之法维持礼法，翊辅教化，维护乡族社会秩序。

三、明代士大夫关于建祠祭祖的主张

祠堂记文里留下了明代特别是吉安士大夫对于建祠祭祖的探讨，这种探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的问题，二是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的问题。

先看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的问题。明初的士大夫肯定朱熹《家礼》祠堂之制，主张以此指导建祠祭祖，并概述这种祠堂在士大夫之家的实施状况。泰和人王直说：“近世朱子斟酌其仪（按，指祭礼），而士大夫家通行之。”^①吉水人周叙进一步指出：“近代子朱子定为祠堂之制，士大夫之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亲，于是孝子顺孙之情始达，凡有力者皆得为之，而人不以为非。江南巨宗旧族尤多，而人不以为僭，盖通祀四世之亲者，以礼以恩也。其间或推本始迁之祖，旁及继承之显者，以情以义也。惟不越乎情味乎义，而后礼之大节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②可知江南旧族不仅依朱子主张设立祭祀四世之亲的祠堂，还有祭祀始迁祖和先祖的，他都从情和义的角度认可。而且周叙“创始祖祠，葺家祠，建先考祠，作世直堂，修宗谱，修祭祀仪注，修家政录，修乡约。”^③周氏祠堂种类有专祠、家祠、始祖祠，还有家庭、乡族建设的多种措施。周叙和王直认为士大夫之家建祠祭祖比较普遍。安福人刘球更指出明初《家礼》影响日大的情形：“至紫阳朱子述《家礼》，首定祠堂之制，为上下通行之则，有先王教民报本之遗意焉。皇朝崇礼以化天下，朱氏之礼遂盛行，由是大夫士家稍克有祠为祀先之所。”^④刘球还说：“朱氏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莫非此意，而世之巨室往往忽而不为。”^⑤安福茨溪刘氏建祠祭祀四代祖先，其制依朱子《家礼》，泰和人杨士奇应邀撰写记文。他指出：“朱子以庙非赐不得立，遂定祠堂之制，于是重水木本源者，皆得伸其追远报本之诚矣。然世遵用之者犹鲜，盖非敦仁尚礼之君子不能也。……凡世老释之宫有作，率得名公巨人为之记述夸诩。祠堂者，知礼复古之为，其系于人心世道非细故也，其可无记？”^⑥他赞扬朱子祠堂之制，为了人心世道写记文倡导建祠堂。杨士奇和刘球认为社会上建祠堂的属于少数，与周叙和王直的说法不尽一致。这就说明，宋以后《家礼》对建祠祭祖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也不能将其过分夸大。

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始祖祠堂日益增多，且祠制不一，一些士大夫主张用程朱的建祠祭祖之礼加以规范。安福伍氏于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祭祀本支近祖。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又葺前街旧居为祠，祭祀始祖以下。荷溪之祠于弘治二年（己酉，1489）扩建，仍然为高祖以下之祠。浙江鄞县人杨守祉为伍氏二祠写了一篇合记，他指出：“古之圣人制为祀典，天子七庙，有禘有祫，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余亦亲尽祧迁而已，况下此者乎。后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庙，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时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且谓祖岂可厌多，苟其所知者，无远近多少须当合祭之。朱子疑其说未及讨论也，乃曰始祖、先祖之祭，伊川（下一字不能辨识）有此说，固足以尽孝子慈孙之心，然尝疑其礼近于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礼》犹存始祖、先祖之祭，盖未成之书与晚年定论不同也。然则士大夫家祭及四世不可过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遗祭田，历世虽远，不得废祀，若安福伍氏两祠堂是已。员外公始为荷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既合礼矣。方伯为前街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长史，则十八世祖也。不已过乎？岂以程子所言，无远近多少须当合祭之，而不疑其说之未及讨论者耶。抑以朱子所言，尽孝子

^① 王直《抑庵文集》卷三《奉先祠记》，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62页。

^② 周叙《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七《万安周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31册第736页。

^③ 萧铤《尚约文钞》卷一一《翰林侍讲学士周公墓志铭》，四库存目集部第33册第15页。

^④ 刘球《西溪文集》卷四《棠溪王氏先祠记》，四库全书第1243册第455页。

^⑤ 刘球《西溪文集》卷四《李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43册第483页。

^⑥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茨溪刘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71页。

慈孙之心，而不疑其礼近于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国初以至于今，登进士为显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先之礼其亦过于厚耶。然则如之何而可也，祠堂之祀，止于四世，四世之上，瘞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废祀者，祭之墓所可也。若曰丧祭从先祖，有举之莫敢废也。伍氏子孙世守先世之成规，而勿废坠焉，亦可也。予言未必合理，请勒之丽牲之碑，以俟后之知礼者考定云。”^①他对伍氏的始祖祠不以为然，认为其祭祖世代过厚。说程颐对自己关于始祖、先祖之祭的主张有保留态度，朱熹《家礼》中保留了程颐的主张，未成定论。人们应当按照朱熹的真正意思，墓祭始祖。

永新人尹襄对当地的始祖祠亦不甚满意，主张应该真正理解程颐始祖、先祖之祭的原意，用朱熹《家礼》改造始祖祠。正德九年（1514）同邑刘姓扩建新祠，尹襄在其所作记文中指出：“予朱子祠堂之制，盖酌文质之中，揆礼俗之宜，而使贵贱丰约皆得以通行之。其名式虽不尽合于古，而古之意存焉，圣人复起，无以易焉者也。顾世之贤者，或病财时之难兼，而凡民之愚，率诳于异端荐禳之说，莫克知而由之。圣明治天下百数十年，既富且教，文化渐被，然后公卿大夫士之家莫不有祠堂，以奉其先。呜呼盛矣！礼乐百年而后兴，此其验欤。……顾祠虽昉于朱子，而世之用礼者，往往与朱子异，则有不可不辨者，朱子之礼止四代，祫止旁亲之无后者，大宗一，小宗四，各有祠焉。以奉其祖若祫而不得同也。今之故家巨室欲合人心，率有始祖之祭，祖虽当祫，同居而有亲未尽者不祫，则祀非四代矣。合其族之祖祫旁亲而祭于一堂，则祠不分而祫者杂矣。夫合焉则不顺乎礼，异焉则不通乎情，二者安所取衷哉。予谓堂可同矣，室不可以不异也；祫可增矣，序不可以不明也；事可协矣，统之不可以非其宗也；四代不可以过，而始祖之祭冬至可以行也；四时之祭不可以混，而始祖之祭合而祫之可也。而得礼之意，则虽朱子复生，亦将听之而不禁也。”^②尹襄在朱熹礼意的指导下，对始祖祠提出了从宜从俗的改进意见。尹襄还认为社会上以始迁祖或有功德者为始祖不符合程颐始祖原义，但又表示以义起礼，尚可认同。他对戴氏祠祭宋代始祖提出：“然则始祖之祭有义乎，曰此以程子之言为之也。程子曰冬至祭始祖，然所谓祖者，厥初生民之祖。今士大夫家概以始迁或有功德者为之，又非程子之意矣。古者诸侯之子及士之始为大夫者，得自为祖，而其子孙继之者为大宗，百世不迁，今之宗法不讲，则始祖之祭又孰尸之。虽然记不云乎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夫上藉先德而无以报，下则族蕃而无以一之，人情于斯能遽已乎，人情之所以不能已也，义不即在于是乎。故此祭始祖者，其以义起礼之类欤。”^③从文意体会，尹襄虽认可始祖之祭，似有一些勉强。

以上是正德以前一些士大夫的看法，嘉靖以降的士大夫对程颐始祖之祭的主张和社会上的族祠更为认同，且这种认同更为自觉。吉水人尹台的一些主张表现的比较明显，他为吉水罗洪先所修通祠所写记文说：“是故伊川始先之祭，为百世不迁之宗计也，岁有常报，主之以继大宗。考亭祠堂之制，为五世则迁之宗计也，神有定依，主之以继小宗。凡以士庶人无庙之家，因之修其孝飨。斯礼也，虽古之所未有，而以为义起也非欤。顾今世家大族往往遵伊川始先之祭，而并用考亭祠堂之法。于稽其义，已与之寔远，而况聚族之力侈力一祠，甚或题棹楠僭拟王侯，观于气数升降之间，有能合礼者鲜焉。兹其务外相先之过，比于离本弃始之失，所相埒几何。而好论者不是之咎，乃徒病始先之祭，疑近禘祫之僭，而祠堂兴创非祭寝者之得为也。於乎！其无亦不原儒先义起之故，而所云因时变礼，就其曲为之计者，或未深察也乎。夫伊川始先之祭未闻专庙，考亭祠堂之主止列四亲，固与今之族侈一祠、祠重始先者殊致。然余犹有取焉，取其足守族训家教宗法之已坏，比党相维之势因之可渐成，其效固非曲学拘说者之能喻也。夫礼失而求其次，称礼君子抑何以讥云。”^④他明确指出程

^① 杨守祉《碧川文选》卷三《安福伍氏两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42册第82-83页。

^② 尹襄《巽峰集》卷七《樟枫刘氏增修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07-209页。

^③ 尹襄《巽峰集》卷七《戴氏重修乐伦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09页。

^④ 尹台《洞麓堂集》卷一《贺野航李君修通祠成序》，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423页。

颐的“始先之祭未闻专庙”、朱熹“祠堂之主，止列四亲”，今之族祠不符合程朱之礼，而且过于奢华，但是并不能以祭祀始祖“近禘祫之僭”指责庶人建祠，因为始祖祠可以守族训家、挽救宗法、维护乡族社会秩序。事实上罗洪先走得更远，认为程朱本身就主张祠祭始祖，他说：“祠议始程朱，程朱推祀至始祖，不嫌禘祫物未备也。”^①尹台在为永新牛田尹氏所写祠记中，重申始祖祠挽救宗法的意义，他说：“抑或言始祖冬至之祭，虽出大贤旨训，然考诸礼，若不能无疑于僭者，故文公未定四礼，黜其仪不载。乃我吉郡大家，比率遵行罔懈，岂无所取而冒为之耶？盖宗法亡而世族之涣莫收，于是称故姓子孙有贸焉。不知其祖之所自出者，忘祖弃族，民是以益偷，始祖之立祠而祭也，尚可以救宗法之微乎。……故礼苟足以矫民振世，则虽先王未之有，犹可以义起之也，矧大儒成议昭昭乎其足据持哉。”^②文中再一次反映出吉安世家大族祠祭始祖的普遍性，用礼以义起为之辩护。

嘉靖以后士大夫主张折中程朱同时祭祀远祖和近祖。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致仕，里居二十余年，嘉靖二十六年卒。作为思想家，罗钦顺的祠堂祭祖观念值得注意，他在《整庵存稿》卷二《胡氏重建祀先堂记》对祭礼有一段重要论述，提出：“窃惟古礼之幸存于今，才百什之一二，其涉于形器者虽可概举，至于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处之当为难。姑以祭礼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则岁周于远祖；如晦庵朱先生所定，惟时举于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礼学之宗，而其所出乃不同如此，有志于礼者可不审乎！今吾乡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礼之行，各有所受。盖周及于远祖者，近代之祭颇略而不专，致隆于近代者，远祖之祭或废而不举，揆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于一本，心同萃一堂，则自始祖而下，岁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祢而上以至高祖，则当各随所继而于时祭每致谨焉。庶几远近有伦、恩义兼备，虽不能尽合于古，亦当无大谬已。然区区之见，未当就正于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镇江之事，进阶奉训大夫以归，其族人又多读书知礼，幸相与参酌余言而审处其当，使礼之行而乡人颂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则岂不有以增于斯堂轮焕之美，而垂永世之规哉！”^③由此可知，罗钦顺是把祠堂祭祖作为礼制讨论的。他认为程颐主张祭远祖、朱熹主张近祖均值得重视，在泰和大族建祠堂普遍，所行祭祖礼受到程朱影响而各有不同，不论强调祭祀远祖或是近祖，均有偏颇，不符合人情。他主张始祖而下的远祖当岁祭，高曾祖祢近代祖先由其子孙时祭。如此兼顾了远近和恩义。罗氏也知道他的主张不能尽合于古礼，且未同研究礼学的人讨论，但是他仍然提供给建祠者参考，并被采纳。罗氏还把这一礼学实践视为垂永世之规，表现出相当的自信。罗氏之所以提出折中程朱的主张，既是保存二者的精微之深意，也是从人情出发制定礼仪，坚信无大谬。《整庵存稿》卷二还载有罗钦顺的《泰和山东王氏祠堂记》^④，可知该祠建于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王氏不仅祭祀远祖，也祭祀近四代祖先，与罗钦顺的主张一致，所以罗氏“嘉其所举合义”。罗钦顺在记文的开头说：“礼之行于家者，惟祭为重，所以报本而追远也。此人道之大端，孝子慈孙之至情也。去古虽远，遗经尚存，制度仪文犹有可考。而因陋就简，其来已非一日，虽贵极卿相，有家庙者亦云鲜矣。知礼之君子，盖深病之，于是乎祠堂之制起焉。其为制也，盖参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则神主有所藏，人心有所系，昭穆有序，尊亲并隆，仁让之兴未必不由乎此，其有裨于风化岂小哉。”罗氏基于家庙制度难行，祭祖可兴仁让，有裨于风化，肯定了参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的祠堂之制。最值得注意的，是罗钦顺不仅仅主张折中程朱同时祭祀远祖和近祖，还付诸实践，修建了本家族的大小宗祠。《整庵存

^① 罗洪先《念庵文集》卷十《月冈曾氏宗祠明禋堂碑铭》，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204页。

^② 尹台《洞麓堂集》卷四《牛田尹氏族祠祭田记》，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513页。

^③ 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二，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32页。

^④ 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二，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33-34页。

稿》卷十五收有祭文两篇，一篇是《祭告始迁西冈祖大观府君请神主入新祠文》，^①该文无写作年代，因卷按年编排，前一篇《谒族高祖乐志府君墓告文》作于嘉靖六年，而是年为罗钦顺致仕之年，故新祠当是改作于致仕不久。可知该祠所祭始迁西冈村祖先大观府君系阙城罗氏六世祖、罗钦顺高祖之曾祖，大观府君与罗钦顺已出五服^②，新祠主祭大观府君神主，是一座大宗祠。另一篇是《祭告三代考妣请神主入小宗祠文》，^③该文也无写作年代，列于前文之后，当是大宗祠建成不久所作。该文为曾、祖、考三代神主入祠而作，祠中左第一室当是已有高祖神主，确如祭文所说，是遵照国典祭祀四代祖先的小宗祠堂。依据罗钦顺的官位，实际上就是家庙。由上可知，罗钦顺在致仕不久重视宗族制度建设，完善了本族的大小宗祠。罗氏大宗祠的设立，是对传统宗族制度的违礼愈制，或许反映了嘉靖初年士大夫宗族建设的动向。

其后，尹台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迨宋诸儒始间议冬至始祖之祭，而纂《家礼》者，又以时制士大夫不得立庙其家，则祀先无所于托，孝志将为之湮也，故肇立祠堂之制。使无贵贱皆得通祀其四世之亲，殆酌古今礼制之中者，乃其义则曲备矣。惟今故家右族，虽并有祠堂之建，然夷考所祀，往往特重始迁之祖，而于四世之亲或忽之，若可概也。视宋诸儒所论载，不无少相戾。然士大夫之讲是则久矣，岂无义而卒行之，其必施之典礼可会通，推于世教，足为维持辅翼之具，不独祭之义行焉耳。闻之先王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盖自封建一坏，宗法欲复行难已。是故无诸侯大夫支庶之继祚者，则无五世一迁之小宗，无小宗故分之不能类其异，繇是世远而人莫知所从出，服穷亲尽，至相视若途之人，抑势之宜不免云。故始祖之祀，虽于三代礼制不皆协，然其追远报始之思，合崇一祖以为百世不迁之祖，而四世之亲或各从其服属，祀之于私寝，所谓大宗一而小宗四，庶几古法亦因以行乎。其中非记所谓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者与。繇是极祭之诚，则孝思可感乎百世，而百世之祖、百世之子孙，欣然合萃一堂，忘其远迹戚疏之瞬间，则始祖之祠建，谓犹行古之道，而足为世教之维持辅翼也。”^④他对当时特重始迁之祖而忽视四世之亲不满，认为在始祖祠外，应当于私寝祭祀四亲，以折中程朱。

万历时期，安福人刘元卿主张以《家礼》改造始祖祠，兼顾四亲之祭与始祖之祭：“古者庶人祭于寝，而后乃改用堂云，然其时家自为祠正寝之东，为四龛以祀四世，继高祖之小宗，则高祖居西，神道尚右也，次曾祖、次祖、次父，以序而东，祭曾祖之小宗不敢祭高祖，而继祖之小宗，不敢祭曾祖，继祚之小宗，不敢祭祖，大抵一祠之中为龛四，为主八，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附而已。今且族立一祠，尽以其主来附，祭之日，宗子主祭，诚有所专，而其余主尽若旁亲无后之附食者，然为人子孙者，宜于此焉变矣。予以为今人正寝稍北，往往为龛奉神，移以祀先，如前所谓祀小宗之法，不犹愈于祀外神者乎。族之总祠，世近而同高祖，则合祀高祖，以祭高祖之玄孙主之，余皆入而助祭焉；世远而高祖已分，则合祀始祖，以族之长者主之，余皆入而助祭焉。斯则今日祭法之当议者也。顾相沿已久，猝然行之，怠者惮繁，鄙者怪费。则又安得遂复古礼而骤革其苟简之陋习乎。……予与翰吉君论祠制有日矣。夫四代之祭，品官之制也。国初许庶人祭三代，既而修会典，竟令庶人祭其祖、父，则三代之祭犹为僭也，今祭及四代矣，又及始迁之主矣，又及各派初分之始祖矣。斯又可谓过于厚也。乃一祠之中，高祖而上不忍祧，高祖而下不欲分，是祠且为委祖之壑，褻亦极矣。独苦于沿旧莫能革也。”^①合族建祠祭祀始祖以来的祖先已是当时吉安普遍情形，士大夫的主张改变不了社会现实。

再谈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的问题。早在明初，士大夫就把建祠祭祖作为合族的手段。

^① 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五，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203页。

^② 参见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四《先吏部府君行述》，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84页。

^③ 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五，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203-204页。

^④ 尹台《洞麓堂集》卷四《泰和杨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533页。

泰和人梁潜指出：“后世宗法之废，而以谓统其宗者有在于谱牒焉；祭法之失，而以为合其族者有在于祠祀焉。盖虽不逮乎古，而犹近乎古也。舍是不务，其涣散分析，迷其本源而不知者，可胜慨哉！”^①视祠祀与谱牒有防止宗族涣散分析同样的功效。泰和人尹昌隆也强调建祠合族的重要性：“予惟古者大夫士庶之家，祭于庙、祭于寝，未闻有祠堂也。自后世而观，庙非爵位而为之则僭，寝非古聚庐而又近于渎。今吴氏即正寝旧地以为堂，岂惟足以摅其追远之诚，抑且以寓夫合族之道。可谓变礼而协诸义矣！惟其子孙孙子引而弗替，咸合精会神于斯，以致夫孝享，则岂非所望相与扶吾仁义于百世而不坠耶。予观近世士大夫家，堂室非不壮丽，乃惟肖祀淫神异鬼，以徼非望之福，而祖宗神明往往无所衣食，则斯堂也夫岂不足为薄俗观哉。”^②认为建祠虽然未必符合古礼，但“义”之所在，还可以矫正薄俗。安福人李时勉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说：近世以来，故家大姓有聪敏而知礼仪者立祠堂、备祭器、置祭田，讲求其礼而兴行之。“仁人孝子循而仿之者日以益众，虽不尽合古制，而敦睦长厚之风由是而起，亦庶几乎古人之遗意也。”^③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认可祠堂制度。

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更重视始祖祠堂管理族人的功能，强调其功能的多样化。正德四年（1509）万安黎氏建成祠堂，该祠前堂后寝，寝中牌位设置为：上设四室以藏四代之主，旁列二庑以藏群从之祖，又上则始祖之主，左右则不迁之主。是四亲之祭与始祖之祭的结合。江西大庾人刘节为之作记，他在赞扬该祠后，又对建祠祭祖与祠堂的多种功能发表见解：“夫修庙以萃涣也，崇祀以追远也，尊祖以广孝也，亲族以厚伦也。皆于祠乎备也。是故萃涣以致神也，追远以反始也，广孝以敦爱也，厚伦以合敬也。合敬以立义也，广孝以尽仁也，反始以厚本也，致神以尊上也。肃以持之，诚以将之，礼以节之，乐以和之，假之来假，享之来享，而福禄攸介中锡无疆矣。是故先王制礼莫重于祭，君子营室祠堂为先，率是道也。黎氏世有良士，崇礼敦化，笃义求德，敏于作祠，知所先矣。推而广之，曰置祀田，曰修宗谱，曰立家范，曰严俗戒，咸举于祠，以考成焉。”^④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有两层：一为开头部分，从三个层次递进说明修庙、崇祀、尊祖、亲族的意义；二是结尾部分，提出祠堂置祀田、修宗谱并且设立族规家训。旨在把祠堂作为管理族人的场所，以祠堂为核心建立宗族的各项制度，是宗族组织化。嘉靖十五年（1536）吉水邹氏祠堂建成，同邑毛伯温对吉水建始祖祠堂进行议论：“君子营宫室，必先立祠，祠者祀也，祀其四代之先也，礼也。邑之名族率有祠，乃自始祖以下，世之远、服之暂，皆得入祀。众主错杂，或置大屏，中书始祖，左书各祖考，右书各祖妣，雁鹜行以降无弗祀者，是于礼无所欲据，且失之僭，恒以为疑。或曰是所以一族也，夫族之繁者，不有以一之，则乖礼于法，启侮速辜，强或凌弱，卑或犯尊，故有祠一之也。是故无嫌于合祀，稽之冬至始祖之祭、立春先祖之祭，此古礼所无，而伊川程子以义起之者也。今之祠设始祖一位，于冬至合族之人祭焉，至于立春，则至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用纸书而祭之。朔望必参，有事必议，申谕子姓，胥集于祠，有弗率者请于祠，咨其长科责之，其不悛者，金曰宜抵于法则质之官。君子曰其志将以叙睦而救弊，是尚愈于社也。”^⑤毛伯温认为当地的始祖祠不符合礼法，但从族祠“一族”的功能出发，主张祠祭祖先以程颐所定为是，并赋予族祠法律责任，“以叙睦而救弊”，视宗族优于乡社组织。

总之，以上探讨建祠祭祖的明代士大夫基本上是高级官僚或学者，比较正统，在始祖祠普遍化的社会现实面前，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一方面又试图将其纳入礼制，把《家礼》的主张纳入到始祖祠，折中程朱，兼顾始祖之祭和四亲之祭。士大夫之所以承认始祖祠的存在，除了满足族人祖先崇拜的心理需求外，还看到了始祖祠治理宗族的功能，以之维护

^①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鱼石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8页。

^② 梁潜《泊庵集》卷七《于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346页。

^③ 尹昌隆《尹讷庵先生遗稿》卷三《祀先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26册第474页。

^④ 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三《杨氏重修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699页。

^⑤ 刘节《梅园前集》卷一七《万安城南黎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57册第380页。

乡族社会秩序，这也是针对明中叶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社会变化做出的反应。

四、结语

明代吉安建祠祭祖的盛行，与其人文、社会以及自然的环境分不开。吉泰盆地开发较早，经济与文化均较强盛，唐宋以来出了不少因科举成功而仕宦者，重视儒学和文化，多有世家大族，祠堂集中这一地区。明代吉安宗族祠堂设置兴起于永乐以后，正德以后加快了建祠速度，至明末建祠速度减慢。明代建祠祭祖有一个从前期家祠向中后期始祖祠祠，或曰从前期小宗祠向中后期宗祠演变的过程。明代吉安宗族祠堂事例大约将近一半是在旧祠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其中又有相当数量的宗族在元代已经设置祠堂，吉安宗族建祠祭祖有比较深厚的基础。

吉安宗族设立祠堂祭祖大致是从元代开始的，元代吉安宗族建祠祭祖已经比较成熟。明代吉安宗族制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成熟，主要表现在宗族在建祠祭祖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修族谱、行墓祭、置祭田、设义塾等举措，有意识地采取制度“创新”来合族，维持乡族社会秩序。倡行建祠祭祖等宗族建设的主要是士大夫，祠堂记文的作者多是吉安出身的名宦宿学，前者的作为受到后者的赞扬和支持，形成了当地的舆论崇尚。吉安宗族设祠祭祖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个特点，是总祠的出现。明代中后期吉安大姓宗族兴建总祠合族，实际上吉安在元代已经出现个别总祠，至明代中后期则普遍化，吉安的大族以总祠为重要手段使宗族组织化。建祠不仅是为了祭祖、聚会以及办理族务，更重要的是以宗族之法维持礼法，翊辅教化，维护乡族社会秩序。

祠堂记文里留下了明代特别是吉安士大夫对于建祠祭祖的探讨，这种探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祠堂功能与宗族制度化的问题，二是四亲之祭和始祖之祭的问题。明初的士大夫肯定朱熹《家礼》祠堂之制，主张以此指导建祠祭祖。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始祖祠堂日益增多，且祠制不一，一些士大夫主张用程朱的建祠祭祖之礼加以规范。永新人尹襄主张应该真正理解程颐始祖、先祖之祭的原意，用朱熹《家礼》改造始祖祠，反映了正德以前一些士大夫的看法。嘉靖以降的士大夫对程颐始祖之祭的主张和社会上的族祠更为认同，且这种认同更为自觉。罗钦顺肯定了参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的祠堂之制，主张折中程朱同时祭祀远祖和近祖。其后尹台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对当时特重始迁之祖而忽视四世之亲不满，认为在始祖祠外，应当于私寝祭祀四亲，以折中程朱。万历时期，安福人刘元卿主张以《家礼》改造始祖祠，兼顾四亲之祭与始祖之祭。早在明初，士大夫就把建祠祭祖作为合族的手段，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更重视始祖祠堂管理族人的功能，强调其功能的多样化。

A Research on Memorial Ceremony at Clan Ancestral Hall in Ji'an Fu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ianhua

(Center for Social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Tang and the Song dynasties, big clans of influential families established by high officials assigned through th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had developed in Ji'an, Jiangxi Province. Those big clans attached importance on Confucianism and culture and built their clan ancestral halls to offer sacrifices to their ancestors. Memorial ceremony at clan ancestral halls had been relatively well developed and there were some general ancestral halls in Ji'a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building of clan ancestral halls in Ji'an were started aft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Yongle,

accelerated in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Zhengde and slowed down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n evolution from family halls in the early times to the first ancestor's hall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imes, or in other words, from small clan halls in the early times to clan ancestral hall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imes when general ancestral halls became common. Clan system was furthered and matured in Ji'an in the Ming Dynasty when clan ancestral halls were built to offer sacrifices to ancestors while many measures, including compiling genealogy, offering sacrifices at tomb, purchasing land for sacrifice and establishing free private schools, were taken consciousl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to integrate clan and to maintain local and clan social order. According to records of clan halls written by Ji'an's scholar-officials, how to build a clan ancestral hall and offer sacrifices in memorial ceremony were discussed, focusing on issues like functions of clan ancestral hall, clan institutions, memorial ceremonies for four parents and that for the first ancestor.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scholar-official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clan ancestral hall to govern clan people and emphasized on its functional diversification.

Keywords: The Ming Dynasty; Ji'an; Clan; Memorial Ceremony at Clan Ancestral Hall; General Ancestral Hall

收稿日期: 2005-01-30

作者简介: 常建华 (1957-),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① 毛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卷四《邹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 63 册第 277 页。

附：《明代吉安宗族祠庙祭祖事例表》资料出处（序号与表中相同）

- 1、梁潜《泊庵集》卷七《于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37 册第 345-346 页；梁潜（1366-1418）洪武二十九年举于乡，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2、尹昌隆《尹讷庵先生遗稿》卷三《祀先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 26 册第 473-474 页；尹昌隆，泰和人，洪武三十年进士，永乐初被杀，据此推断建祠时间。
- 3、王直《抑庵文集》卷三《奉先祠记》，四库全书第 1241 册第 62 页。
- 4、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三《杨氏重修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42 册第 698-699 页；李时勉（1374-1450），安福人，永乐二年进士，卒于景泰元年，据此推断建祠时间。
- 5、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三《刘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42 册第 699-700 页。
- 6、李时勉《古廉文集》卷三《潘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42 册第 700 页。
- 7、周叙《石溪周先生文集》卷七《万安周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 31 册第 736-737 页；周叙（1392-1452），吉水人，永乐十六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8、刘球《西溪文集》卷四《棠溪王氏先祠记》，四库全书第 1243 册第 455-456 页；刘球（1392-1443），安福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9、刘球《西溪文集》卷四《李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43 册第 483-484 页。
- 10、王英《王文安公诗文集》文集卷三《吉水泥田周氏祠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1327 册第 340 页。
- 11、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茨溪刘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 1238 册第 371 页。
- 12、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杨氏祠堂复建记》，四库全书第 1238 册第 27 页。
- 13、刘定之《江西永新牛田尹氏承庆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尹氏族史研究所 1998 年版第 634-635 页。
- 14、佚名《江西宁冈大陇尹氏祠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 635-636 页。
- 15、彭时《江西吉水新市尹氏宗祠世显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 636-637 页。
- 16、彭勛《江西吉水枫塘尹氏双义祠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 643-644 页。
- 17、罗璟《江西泰和灌塘坑口重建祠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 644-645 页。
- 18、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上模曾氏续置祭田记》，四库全书第 1261 册第 17 页。
- 19、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三《吉水富溪王氏始祖祠记》，四库存目集部第 80 册第 706-707 页。
- 20、杨守祉《碧川文选》卷三《安福伍氏两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 42 册第 82-83 页。

- 21、杨守祉《碧川文选》卷三《安福伍氏两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42册第82-83页。
- 22、鲁铎《鲁文恪公文集》卷六《罗氏重建敦本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54册第75-76页。
- 23、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二《胡氏重建祀先堂记》，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31-32页。
- 24、刘节《梅园前集》卷一七《万安城南黎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57册第380页。
- 25、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一七《村前彭氏二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1册第178-179页。
- 26、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一七《村前彭氏二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1册第178-179页。
- 27、毛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卷四《邹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3册第277页。
- 28、欧阳铎《欧阳恭简公文集》卷二《孝义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4册第29页；欧阳铎（1487-1544），泰和人，正德三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29、锺芳《筠溪文集》卷九《庐陵杨氏忠节总祠》，四库存目集部第64册第575-576页。
- 30、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四《庐陵黄氏先祠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6册第10-11页；邹守益（1491-1562），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31、尹襄《巽峰集》卷七《樟枿刘氏增修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07-209页。
- 32、尹襄《巽峰集》卷七《戴氏重修乐伦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7册第209页；根据上一篇记文推断此篇所记祠堂重修时间。
- 33、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二《泰和山东王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33-34页。
- 34、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沅州守素庵曾公祠记》，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18-19页。
- 35、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五《祭告始迁西冈祖大观府君请神主入新祠文》，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203页。该文无写作年代，因本卷按年编排，前一篇《谒族高祖乐志府君墓告文》作于嘉靖六年，而是年为罗钦顺致仕之年，故新祠当是改作于致仕不久。
- 36、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一五《祭告三代考妣请神主入小宗祠堂文》，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203-204页。该文也无写作年代，列于前文之后，当是大宗祠建成不久所作。
- 37、罗洪先《念庵文集》卷十《月冈曾氏宗祠明禋堂碑铭》，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203-204页；罗洪先（1504-1564）吉水人，嘉靖八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38、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一一《秀川罗氏大时冈重建祠堂上梁文》，四库存目集部第90册第21-22页。
- 39、罗洪先《念庵文集》卷一八《大安重建祠堂上梁文》，四库全书第1275册第416-417页。
- 40、尹台《洞麓堂集》卷一《贺野航李君修通祠成序》，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423-424页；尹台（1506-1579），吉水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41、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三《朝宗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80册第709页。
- 42、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六《梅溪戴氏祠堂碑》，四库存目集部第116册第358-359页。
- 43、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十《小宗祠碑》，四库存目集部第129册第522页；郭汝霖，永丰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隆庆六年致仕，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44、尹一仁《石图记》、刘阳《江西吉安宋节度使崇珂公祠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57-658页，第658-659页。
- 45、尹台《洞麓堂集》卷四《泰和杨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532-534页；尹台（1506-1579），吉水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据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46、胡直《衡庐续稿》卷三《敦典堂记》，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714-715页。
- 47、宗武《江西泰和瑶溪孝友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4页。
- 48、龙遂《江西永新竹山鸥溪洋埠祠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6-667页。
- 49、王命爵《江西泰和云盘洲承德堂宗祠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8页。
- 50、尹新《江西永新竹山祖祠》，《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68-669页。
- 51、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杨宅赵氏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4-145页。
- 52、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著存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6-147页；刘元卿（1544-1609），安福人，隆庆四年举于乡，据文中记事、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53、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桃溪大分姚氏祠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7-148页。
- 54、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鱼石祠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8页。
- 55、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七《（上一字看不清）塘谭氏修祠赈祖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149页。
- 56、曾同亨《江西永新牛田尹氏重修宗祠承庆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70-671页。
- 57、龙遇奇《江西永新南塘大经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71-672页。
- 58、胡经《江西吉安富田小宗祠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73-674页。
- 59、施逢元《江西吉水枫塘尹氏忠孝堂记》，《中华尹氏通志》第一分册《族史文献》，第676-677页。
- 60、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下《南溪萧氏总祠》，四库全书第1294册第211-213页；邹元标（1551-1624），吉水人，万历五年进士，据文中记事、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61、郭子章《粤草》之五《南溪萧氏忠孝堂鑑瓶铭并序》，四库存目集部第154册第549页；郭子章（1542-1618），泰和人，隆庆五年进士，据文中记事、出仕和生活年代推断建祠时间。
- 62、郭子章《蟪衣生传草》卷一三《五实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6册第163-164页。
- 63、郭子章《蟪衣生传草》卷二《赠尚书公小宗祠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5册第604-605页。
- 64、郭子章《蟪衣生传草》卷二《曾祖西坡府君祠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55册第671-672页。